引用格式：郑永年, 刘金程. 从“建库”到“增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成效与展望.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6, 41(5): 873-883, doi: 10.3724/j.issn.1000-3045.20260110001.
Zheng Y N, Liu J C. From institution building to decision intelligence enhancement: Achievements and prospects of new think ta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26, 41(5): 873-883, doi: 10.3724/j.issn.1000-3045.20260110001. (in Chinese)

从“建库”到“增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成效与展望

郑永年[1,2]　刘金程[1*]

1 华南理工大学　公共政策研究院　广州　510641
2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　深圳　518172

摘要　自2015年《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出台以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已经走过10年。这10年，既是中国从“有没有智库”迈向“智库好不好”的关键阶段，也是从知识大国迈向思想强国的重要起步。10年来，中国智库建设实现了从“起步构建”向“体系化成型”、从“事后评论”到“全链条嵌入”、从“单点供给”到“多源支撑”、从“被动回应”到“主动发声”的阶段性跃升，国家智库体系逐步完善。同时，知识体系的长期依附性、评价机制的短期化倾向，以及组织结构与人才结构的不匹配，仍使“库多智少”的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破解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厘清智库区别于一般研究机构的特殊职能定位，突出其对重大问题发现与解决能力、研究成果的多层次参考价值与社会影响力，以及研究人员战略性、前瞻性、长远性与现实性研究视角的培育。面向人工智能时代和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国智库需加快由“建库”转向“增智”，迈向质量型新型智库。

关键词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增智，自主知识体系，人工智能，质量型新型智库

DOI　10.3724/j.issn.1000-3045.20260110001
CSTR　32128.14.CASbulletin.20260110001

*通信作者
资助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GD24WTC03）
修改稿收到日期：2026年3月2日；预出版日期：2026年3月27日

1 2015—2025年：10年节点上的思考

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国家崛起的一个最核心表现是知识和思想的崛起，而智库就是现代社会知识和思想的关键发源地之一。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这标志着我国开始从国家战略的高度系统部署智库建设，智库建设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布局之中，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正式进入体系化、制度化发展阶段。此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10年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经历了体系化重塑与结构性扩张，在数量规模、组织类型、知识供给、政策影响等方面均呈现出显著发展态势，基本形成多主体参与、多类型并存、多层级联动的智库新格局。

理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关键在于理解“中国特色”就是要坚持中国道路、立足中国国情、讲好中国故事、服务中国发展，“新型”就是要有新定位、新机制和新模式[1]。特别是相较于西方智库产生于政党竞争、利益集团博弈和媒体市场化的制度环境之中，我国智库具有特殊性。通常而言，西方智库的典型特征是高度党派化和“外部多元主义”——政党、政府、智库、媒体在制度上相对独立，通过竞争和制衡结构化政治空间。这种结构特征也决定了西方智库往往直接服务于某个政党或特定利益集团，也就是政策市场中的“意见企业”[2]。与之相比，由于党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地位，这决定了各类智库——无论是党政智库、科研院所智库、高校智库还是社会智库，均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3]。这决定了中国的多元不是制度外的对抗和对立型的多元。中国文明的理念是“和而不同”“多元一体”，中国智库充分体现了这一理念，即表现为我们所说的制度内的“内部多元主义”[4]：在统一的政治框架之下，通过不同机构、不同系统、不同层级之间的分工合作和意见竞争，形成一种组织化、可治理的多元结构[5]。在这样的结构下，智库与国家的关系不是“外部监督”或“制度对抗”，而是基于功能分工之上的合作。智库需要保持专业上的独立性和判断力，但这种独立性是在国家整体利益框架之内展开的，而不是与国家对立。也正因如此，中国智库一直把提供“建设性”意见作为智库的首要原则，既非毫无原则的批评，也非毫无原则的论证，而是把改进优化国家发展和治理作为自身研究和建言的内在责任。也很显然，把西方那一套建立在意识形态对立和利益集团竞争基础上的智库模式当成普遍标准，再来评判中国，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

与此同时，进入人工智能时代，ChatGPT、DeepSeek等人工智能工具深刻地改变着知识生产、传播与应用的过程，给从事知识生产的机构和人员带来强烈冲击。智库一方面要提出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或具有解释力的新观点和新论断，另一方面也承担着知识生产和创造的重要功能。因此，中国下一阶段的智库建设必须把人工智能的这种影响考虑进去。

基于上述思考，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10年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本文把注意力放在3个问题上：① 我们究竟建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智库体系，取得了哪些实质性成效？② 我国智库建设过程中存在哪些结构性矛盾？③ 在人工智能时代的知识生产变革和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历史任务和挑战面前，中国智库如何完成能力重构，从“数量扩张”走向“质量提升”？

2 10年成效：从“有智库”到“成体系”

10年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多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实现了从“起步构建”向“体系化成

型”、从“事后评论”到“全链条嵌入”、从“单点供给”到“多源支撑”、从“被动回应”到“主动发声”的阶段性跃升，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国家智库体系。

（1）智库建设实现了从“起步构建”到“体系化成型”，中国特色智库体系初步形成。2015年之前，中国在智库建设上尽管已经起步，并存在各种研究机构和政策咨询机构，但整体较为分散、缺乏顶层设计，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智库体系。中央文件出台后，以顶层设计为牵引，以部门配套政策和地方探索为支撑，智库的设立、认定、运行、使用逐步实现制度化，我国逐步形成了涵盖国家智库、部门智库、地方智库、高校智库、行业和企业智库在内的多层级、多类型网络化结构。根据中国智库索引（CTTI）系统数据统计，截至2025年6月底，CTTI来源智库已经达到1 106家。而据宾夕法尼亚大学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TTCSP）发布的《2020年全球智库指数报告》，全球共计11 175家智库，中国有1 413家智库，居全球第2位[①]。这种体系化是中国从“智库大国”迈向“智库强国”的关键。

（2）智库建设实现了从“事后评论”到“全链条嵌入”，智库在政府决策中的实际作用显著增强。在过去10年里，中国智库的作用发生实质性转变。智库不再仅仅是政策出台后的解读者和评论者，而是逐步参与到问题识别、方案设计、技术论证、政策出台、效果评估等全过程。无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顶层设计，还是科技自立自强、“双碳”目标、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金融风险防控、社会治理创新、高水平开放等重大议题，都能看到多个智库长期跟踪、反复论证、持续建言的身影。特别是，目前一批由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和培育单位组成的高端智库方阵逐步形成，深度参与到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决策过程当中，为出台高质量的公共政策提供了智力支撑。

（3）智库建设实现了从“单点供给”到“多源支撑”，依托科研机构和高校建设的专业智库快速发展，使中国智库的知识基础更加扎实。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智库知识的供给依赖于少数部门、学科，对国家治理的智力支撑严重不足。按照中央关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部署，高校和科研院所都是智库体系建设的重要依托力量。10年来，随着高校和科研机构智库建设工作的系统推进，智库知识来源明显多元化，专业基础显著拓展，形成了相互补充的“多源支撑”格局。其中，依托科研机构建设的专业智库，凭借科研积累和优势力量，在技术路线选择、前沿科技趋势判断和科技安全布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高校智库则在理论阐释和知识体系构建方面逐步发力，推动对中国实践的学理化和系统化梳理。从数据来看，在CTTI收录的18 662位智库专家中，有15 576位就职于高校智库，他们多数既承担教学科研工作，同时也在决策咨询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多层级、梯队式、多元化的人才队伍，使得智库研究力量呈现“金字塔式”的多层参与结构，实现了学术共同体广泛参与的转变。总体来看，这类专业智库的快速发展，既增强了对复杂议题的分析能力，也为智库在中长期战略研究、基础制度研究和综合政策评估方面提供了更加稳定、厚实的知识底座。

（4）智库建设实现了从“被动回应”到“主动发声”，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稳步提升。长期以来，我国智库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比较弱、参与比较少、

① McGann J G. 2020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Philadelphia: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21.

作用比较小，与我国综合国力不相匹配。10年来，伴随着全球治理体系深刻调整、国际知识结构不断重塑，我国智库在气候变化、全球卫生、发展合作、数字治理、全球安全等议题上，通过报告、论坛、双边和多边对话机制参与全球讨论，越来越多地从“被动回应者”转向“议题提出者”和“方案提供者”[6]。例如，目前中国智库提出的具有框架性、概念性和议程设定能力的政策叙事，如“共同发展”“数字公共产品”“全球治理倡议”等，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际学者、机构与媒体关注与引用。

概括地说，过去10年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取得突出成绩，在体系化布局、决策链条参与、知识基础强化和国际影响提升等方面实现了实质性突破。智库的组织形态更加完备、治理参与更加深入、研究底座更加厚实、国际表达更加积极，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制度化的知识供给和战略支撑。这些成效构成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10年靓丽的“成绩单”。在此基础上，本文再讨论问题，既不会否定成绩，也能看到不足和未来发展方向。

3 10年反思：“库多智少”与知识短缺

尽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在体系、能力与功能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但从10年整体运行情况看，“库多智少”的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知识供给不足、有效知识稀缺的问题在相当范围内依然存在。所谓“库多智少”，不是针对任何具体机构，而是对总体状况的概括。

10年来，各种“智库”不断挂牌，有些是长期研究积累自然发展而来，有些则主要出自行政需求甚至“牌子冲动”。在一些地方和领域，智库建设也呈现出一哄而上的局面。在评价体系对机构数量、项目数量、成果数量高度敏感的情况下，很容易形成“遍地是智库”的表象，但真正能够在关键问题上拿出高质量判断和系统性方案的智库并不多。所谓“知识短缺”，不是说知识数量不够，而是优质知识在最需要的时候反而稀缺，缺乏真正抓住问题本质、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的理论性成果，真正有助于中国形成自主知识体系的知识并不多。因此，如果只看到智库报告的数量和智库建设的形式，而不追问智库究竟在产生什么样的知识，这10年的讨论就是不完整的。这一矛盾背后，至少有4个深层次原因。

（1）知识体系的长期依附性削弱了自主问题意识的生成。在相当长时期内，许多智库在分析中国问题时，还是习惯于套用西方理论和概念来描绘中国，再在这些前提下讨论政策。这种解释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方便”，但从根本上说，是把中国经验塞进西方的理论框架之中。长期如此，中国就难以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和概念体系。从研究者个人的成长轨迹看，这种依附往往并不是主观选择，而是在既有学术训练和评价体系中“被塑造”出来的。西方理论几乎等同于“理论本身”，被当作唯一可以使用的概念工具箱；不引用这些理论，就很难在“主流期刊”上发表文章，也很难在既有的评价体系中获得承认。对于学术研究尚且如此，到了智库研究领域，如果仍然习惯于先套用一个外来的理论前提，再去匹配中国的现实，那么所谓政策研究就很容易变成对外来理论的一次次“本地应用实验”，而不是对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本身进行重新思考和理论化的过程。说到底，这样的智库产生的多数只是“翻译型知识”和“注脚型知识”，这种状况不改变，智库也就很难成为中国思想崛起的支撑力量。

（2）评价机制的短期化倾向强化了研究行为的“快反应”与“浅思维”。当前，不少智库的内部评价和外部认定，仍然过度强调课题数量、报告数量、采用次数和媒体曝光，而对研究的原创性、解释力和长期贡献缺乏有效识别。这种简单以数量或曝光度为中心的评价机制，容易诱导研究者追逐热点、

赶时间、写“快餐式报告”，缺乏耐心做冷门研究和长期积累，理论创新更无从谈起。在这种评价机制下，不少研究者产出了大量的智库报告，但这些报告能否解决问题可能还存疑。长此以往，研究者的大量时间、精力等资源被投入短周期、重复性强的智库报告中，进一步挤压了深度研究与理论创新的空间，形成一种“忙而不深、多而不精”的结构性困境。

（3）组织结构与人才结构的不匹配制约了系统性知识生产。许多智库仍然沿用传统学科和机构边界，难以形成真正跨学科、跨部门的研究团队[7]。对新兴议题如人工智能治理、数字平台规制、科技安全等，既懂技术又懂制度、既懂经济又懂政治的复合型人才十分稀缺[8]。例如，截至2024年底，我国数字经济人才总量已达3 286万人，然而人才需求规模约6 500万人，缺口仍高达3 200万人以上。预计到2025年底，这一缺口仍将接近3 000万，高端复合型人才短缺问题尤为严峻。《智库人才报告2024》指出，尽管多数智库人才具有跨学科背景，但职称结构的“倒金字塔”特征与“小核心空心化”的组织模式，制约了智库对复杂问题的系统性回应能力。

（4）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建设高质量的新型智库。在还没有完全构建成能够胜任国家发展和治理的智库体系的时候，我们的智库面临来自人工智能崛起的严峻挑战。尽管人工智能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挑战，其他国家的智库也面临同样的情况，但人工智能时代对我们正在构建中的自主知识体系所构成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在传统知识环境下，资料整合、信息梳理和文本生产本身具有较高门槛，智库在这些方面具备明显比较优势，而今这类知识加工能力正被人工智能迅速压缩成本并规模化复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确依然处在一个“知识短缺时代”：不是知识绝对不足，而是面对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更需要高质量的知识、高水平的判断和高层次的理论，而这些恰恰是目前的短板。未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关键不在于继续扩大数量，而在于构建高质量、可积累、能转化、可持续的知识生产体系，以真正实现从“智库数量扩张”向“知识能力建设”的转型。这也是为什么未来10年智库建设的关键词必须从“建库”转向“增智”。

4 “增智”的内涵界定：智库区别于一般研究机构的特殊职能

智库的本质是决策咨询服务机构。与大学、科研院所以追求原创理论知识为主要目标不同，智库的核心职能是围绕公共决策的现实需求，提供有据可查、有据可用、有据可行的政策知识。围绕这一核心定位，智库的“增智”须紧扣三重特殊职能展开。

（1）对国家重要领域重大问题的发现能力与解决能力，是智库“增智”的首要核心。与一般研究机构倾向于在既有学术范式内深耕不同，智库研究必须首先具备问题感知的敏锐性。这意味着智库研究者需要具备超越学科边界的综合视野，能够在高度复杂、动态变化的政策环境中，率先识别出那些尚未进入决策视野、却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关键问题。例如，在“卡脖子”技术竞争尚未全面浮出水面时，率先识别出若干核心领域的技术断链风险，并提出系统性的科技安全布局建议；在全球治理格局加速重组的过程中，提前研判国际规则重写的走向，为中国参与全球议题设置提供概念框架和政策依据——这类超前于决策议程的问题识别，正是智库不可替代的核心贡献。换句话说，智库的核心价值不在于跟随已知问题，而在于发现未知问题——特别是在经济安全、科技竞争、社会治理、国际秩序等领域，能够提出具有结构性分析价值的重大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给出系统性的解决路径。这种问

题发现与解决能力，是智库区别于一般信息供给主体最根本的特征，也是“增智”所要着力强化的首要能力。

（2）研究成果对决策层、管理层、理论层与执行层的多层次参考价值及社会影响力，是智库“增智”的功能标准。智库的服务对象不是单一的，而是覆盖政策生命周期各个节点的多元主体。高质量的智库成果应当能够同时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对决策层而言，需要提供宏观研判和战略选择依据；对管理层而言，需要提供可操作的政策工具和执行路径；对理论层而言，需要贡献具有解释力的概念框架和机制分析；对执行层而言，需要提供明确的行动指引和评估标准。正是这种多层次的穿透力，使智库成果不同于一般学术论文（主要服务于理论层）或行政报告（主要服务于决策层）。能否真正实现这种多层穿透，在一定程度上构成衡量智库“增智”水平的核心标准。此外，智库成果还需要对社会认知产生有益影响——通过参与公共讨论，引导社会理性，推动形成基于研究的共识，这也是智库社会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3）研究人员视角的战略性、前瞻性、长远性与现实性，是智库“增智”的人才前提。智库的综合素质，归根结底体现在研究人员的思维能力和视角特质上。战略性，意味着研究人员能够将具体问题置于国家发展全局的坐标系中加以审视，而非就事论事；前瞻性，要求研究人员能够超越当下，对未来趋势和潜在风险作出有据可查的预判，而非仅仅事后解读；长远性，意味着研究人员愿意承担长周期积累，而非被短期热点牵着走；现实性，意味着研究人员的建议必须扎根国情，可操作、可落地、可评估，而非停留于原则性表述。上述4个特质的有机统一，构成了智库研究人员区别于纯学术研究者的独特素质结构，也是“增智”在人才维度上的核心诉求。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三重特殊职能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而非彼此孤立。问题发现能力是起点，它决定了智库研究的方向与深度；多层穿透的影响力是目标，它检验了智库成果的实际价值；战略性、前瞻性、长远性与现实性的人才素质是基础，它保障了前两者的可持续实现。三者共同构成了“增智”内涵的完整框架，也为下文的讨论提供了必要的起点。然而，明确了三重职能框架，还须进一步追问：这三重职能在人工智能时代的知识生产变革中面临哪些具体挑战？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任务下又承载着怎样的新要求？只有回答了这2个问题，“增智”的路径才能真正落地。

5 面向人工智能时代和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新型智库建设

5.1 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智库建设

要理解智库在人工智能时代为什么必须从“建库”走向“增智”，关键在于把握知识生产方式及其对应的方法论本身的结构性特点。人类迄今为止的社会科学知识，大体分成3种类型：①“形而上”的知识。这类知识主要包括宗教、哲学、思想、观念、价值、情感等，它是以意义和世界观为核心，近代之前的人类知识大多是这种类型。由于它的不可验证性，严格意义上说它不是科学。②“形而下”的知识。这类知识是通过总结和归纳既有事实、数据和经验材料形成的，在推崇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导向的国家非常流行。③介于“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知识。作为连接两者的桥梁性知识，主要用于解释现实运行机制和政策逻辑。

所有的知识都是各种不同类型和层次的方法论的产物。这3类知识也基本对应着各自不同的方法论。①计算工具层面的方法论。它产生“形而下”的知识，主要是对现有知识和材料进行“整合”，当然也包括那些用异常复杂的“科学方法”来论证一些显而易见结论的做法，但这种办法往往很难产生原创性、思想性

的成果。② 作为思维的方法论。对应着桥梁性知识。它强调的是逻辑推理和数学算法，追求普遍性，人们希望通过使用这样的办法来获得普遍性知识，掌握普遍真理。例如，在社会科学中，一些学者经常使用“阶级论”“社会分工论”“科层论”来提出和分析他们遇到的实践问题，但有时本末倒置，为了验证方法和模型的正确性而“削足适履”地寻找经验材料和证据。对于无法解释的社会现实，他们宁可相信是实践出了问题，而不反思工具本身是否适用。③ 作为思维的文化动力学层次的方法论。除了前2种方法论的使用，还需要主动地、自觉地把问题置于自身历史和实践的特性来进行思考。因为知识的产生不仅仅是在思想层面，而是具有更深层次的文明和文化因素。

尽管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但就当前已知而言，人工智能仍然是基于对既有数据和文本的学习与重组，天然擅长处理“形而下”知识，在信息整合、模式识别和文本生成方面展现出强大能力。在提出真正具有解释力的问题、构建新的分析概念，以及在高度不确定条件下进行价值判断和战略选择等方面，人工智能仍难以替代人的智能与智慧。因此，就社会科学知识创造而言，人工智能能够大量产生“形而下”的知识，但很难甚至没有能力创造桥梁性知识和“形而上”的知识——而后两者，恰恰是智库最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所在。从这个意义上出发，如果中国的智库学者把人工智能简单理解为“写作工具”，把技术当作判断的替代物，而不是辅助物，那么所谓“赋能”，很可能变成“去智”。如果智库研究长期停留在“形而下”知识的整合与输出层面，其核心功能将不可避免地被技术工具边缘化。久而久之，研究人员可能逐渐失去自己提出问题、自己组织材料、自己构建框架的能力，变成“算法的执行者”。因此可以说，人工智能时代提出的不是“智库会不会被替代”的问题，而是“什么样的智库会被淘汰”的问题。信息优势已经不再稀缺，真正稀缺的是提出新问题的能力，是在复杂局势中保持清醒判断的能力，是从中国实践中提炼概念和原创性理论的能力。这些能力恰恰是技术无法替代的。而只有将研究重心转向桥梁性知识和“形而上”层面的创新，中国智库才能持续保持不可替代性。

在此意义上，“增智”并非简单增加研究成果数量，也不只是提升文本表达技巧，而是需要围绕人工智能难以替代的知识类型，对智库核心能力进行系统性重构。这一重构须紧扣智库的三重职能展开：在问题发现能力上，要有更强的问题意识和问题敏感性，能够跳出既有话语框架和算法推荐的热点，在复杂现实中识别真正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在多层次影响力上，要有概念与机制建构能力，在大数据与算法工具的辅助下，将问题发现转化为对决策层、管理层、理论层和执行层均有参考价值的系统性成果；在研究人员素质上，要有价值判断与战略责任能力，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对不同政策选项的长远影响进行战略思考，而不仅是技术方案指标的简单比较。换句话说，人工智能不会替代有思想的智库，而一定会淘汰没有思想的智库。技术革命改变的是知识生产的方式，但不会改变知识的本质，更不会改变作为智库的“责任核心”。

5.2 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和新型智库建设

为什么必须把智库建设置于自主知识体系的框架下来思考？原因在于，一个大国如果长期依赖他国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来理解自己，就难免在思想上处于被动甚至思维被殖民的状态。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全球治理中不可或缺的行为体，如果在解释中国和世界的问题时仍然主要依赖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国家自主性的不完整。

所谓自主知识体系，并不是否定或排斥西方，而是要改变那种单向度的“输入-接受”模式。我们需要

在充分学习和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从中国自己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形成以中国问题为中心、以中国经验为基础、能够与世界平等对话的知识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真正的自主，不是拒绝外来知识，而是能够在自己的问题意识之下，对外来知识进行选择性吸收和批判性转化。在这一过程中，智库处在十分独特的位置。一方面，智库长期面对国家现实问题，直接参与政策讨论，最容易感受到中国实践对现有理论的挑战，也最容易捕捉到“新问题”的端倪；另一方面，智库又与学术界有天然联系，可以把实践中的问题带回理论场域，推动概念创新和理论重构。

自主知识体系包括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3个层次，智库在这3个层次上都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在学术层面，围绕中国重大实践生成系统化的研究成果；在学科层面，推动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等领域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基于中国经验的中国理论创新体系；在话语层面，以深入研究为基础，参与构建能够被世界听懂，也能保持中国立场的话语叙事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讲，建设质量型智库与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同一个过程的2个方面。没有质量型智库，自主知识体系就容易停留在口号层面；没有自主知识体系追求，智库就容易被短期项目和碎片化研究牵着走，难以形成真正的知识和思想积累。

6 从“建库”到“增智”：“质量型新型智库”建设的路径

回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10年，制度框架已经搭建起来，体系化格局已经形成，现在真正要解决的是用什么知识去填充这个体系的问题。如果说过去10年主要是“建库”的10年，那么未来10年必须成为“增智”的10年，需要更加明确地把目标指向质量型新型智库。智库工作者首先应该是“有机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政策口号的简单复述者，更不是迎合任何一方情绪的“意见制造者”。所谓质量型智库，说到底是要形成一批有思想的共同体。围绕这一目标，至少有以下5个方面值得重点推进。

（1）以评价机制改革为突破口，把“质量导向”落到实处，并明确体现对智库特殊职能的激励指向。在弱化单一数量指标刚性权重的同时，应将“问题发现能力”和“多层次影响力”纳入评价维度，建立能够识别和激励战略性、前瞻性成果的差异化评价体系。具体而言，对于那些提出了新的重大问题、推动了政策议题形成、在决策层和执行层产生了实质影响的研究，应予以专项认定。对承担基础性、长期性、理论性研究任务的智库和研究者，要给予差别化评价，不能用同一把尺子去衡量所有类型的智库和所有方向的研究。

（2）从组织结构上为长期研究和跨层次知识生产创造条件。质量型智库不可能再沿用“单兵作战、短期冲刺”的传统模式，而需要更多围绕重大议题组建跨学科、跨部门的稳定团队，在10年甚至更长周期内持续投入，真正形成对复杂问题的系统性理解。特别是，跨层次知识生产——同时满足决策层、管理层、理论层和执行层不同需求的研究——本身就要求团队内部具有层次化的分工与协作机制。这需要智库在内部管理上为长期研究留出空间，而不是让所有研究都被短期项目压缩和碎片化。

（3）在人才体系上推动从“项目型人才”向“战略型思想人才”转变。智库当然需要善于执行项目的研究者，但更需要有能力提出重大问题、进行系统分析、作出战略判断的“思想型”人才。应着力培育兼具理论深度、现实理解和价值判断能力的战略型思想研究者，尤其要强化其研究视角的战略性、前瞻性、长远性与现实性——这4个维度是智库研究人员有别于一般学术研究者的根本素质特征，也是评价和培养智库人才的核心坐标。制度安排要在薪

酬、职称、流动机制等方面，对这类人才给予足够重视和激励。

（4）把人工智能纳入智库方法论框架，而不是把它当作写作工具。这一路径直接服务于前述三重职能的实现：明确人工智能主要用于“形而下”知识处理环节，以技术解放研究人员，才能将有限的智识资源集中于问题发现、概念建构和战略判断等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环节。智库研究人员需要系统学习大数据分析、算法建模、文本挖掘等新工具，但必须在明确问题意识和理论假设的前提下使用，用技术拓宽视野、验证假设、丰富证据，而不是让技术主导问题、替代理论。只有当智库在组织结构和激励机制上真正围绕“不可替代能力”展开配置，“增智”才能从理念转化为可持续的实践路径。

（5）建设开放的国际对话网络，把中国经验和中国理论带进全球知识体系。这一路径是质量型智库三重职能中“多层次影响力”在国际上的延伸，意味着其不仅要有能力为中国决策提供高质量知识，还要有能力在国际舞台上解释中国、阐释中国方案、参与规则讨论，从而对国际决策层、管理层和理论界产生真实的参考价值与影响力。这要求智库有意识地培养具备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研究者，以持续研究为基础，而不是以短期宣传为导向，能够参与全球议题讨论。

总之，在一个大国崛起的过程中，物质力量当然重要，但最终决定这个国家能走多远的，仍然是知识的力量和思想的高度。智库建设，说到底是中国思想崛起的一部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在过去10余年中成功完成了“建库”阶段，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支撑。进入人工智能时代，随着知识生产方式和竞争环境的深刻变化，从“建库”走向“增智”，不仅是发展重心的调整，更是智库角色和使命的再定义。这一转型的核心，正在于围绕智库的特殊职能定位——问题发现与解决能力、多层次知识影响力、研究人员的战略性视角——系统重构知识生产的方向与方式。只有在制度上把质量放在首位，在评价上尊重原创性和长期贡献，在方法论上，更多调整到思维层面及作为思维的文化动力学层面，中国才能不仅在经济和制度层面，而且在知识和思想层面成为现代化强国。

参考文献

1 杜志章, 程聪瑞, 王媛媛, 等.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这十年——回顾、反思与展望. 决策与信息, 2024, (6): 14-33.
Du Z Z, Cheng C R, Wang Y Y, et al. Construction of new think ta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ver the past decade: Review, reflection and outlook. Decision & Information, 2024, (6): 14-33. (in Chinese)

2 李荣志, 高小平. “合-分-转”机制：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知识生产的基本模式——兼与西方智库知识生产模式的比较. 南京社会科学, 2024, (11): 64-73.
Li R Z, Gao X P. “Combine-divide-transfer” mechanism: The basic mode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of new think ta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comparison with western think tank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 Nanji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24, (11): 64-73. (in Chinese)

3 何宛玲, 王周谊. 加强党对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的全面领导. 智库理论与实践, 2024, 9(1): 11-20.
He W L, Wang Z Y.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overall leadership over the construction of new-type university think ta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nk Tank: Theory & Practice, 2024, 9(1): 11-20. (in Chinese)

4 郑永年. 内部多元主义与中国新型智库建设.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6.
Zheng Y N. Internal Plural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type Think Tanks in China. Beijing: Oriental Publishing House, 2016. (in Chinese)

5 姜尔林.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到底“特”在何处?——比较知识体制的视角. 中国行政管理, 2022, (5): 97-103.
Jiang E L. What is the genuine feature of the new-style think ta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knowledge institution.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22, (5): 97-103. (in Chinese)

6 周湘智.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趋势与走向. 智库理论与实践, 2022, 7(6): 1-10.
Zhou X Z.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future direction of new types of think tank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nk Tank: Theory & Practice, 2022, 7(6): 1-10. (in Chinese)

7 靳诺. 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的建设和发展. 中国高等教育, 2019, (20): 4-6.
Jin 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type university think ta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a Higher Education, 2019, (20): 4-6. (in Chinese)

8 刘西忠. 贯通融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新型智库高质量发展必由之路——兼论智库科学的构建.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2, 37(2): 168-176.
Liu X Z. Integration of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Only way to develop new think tanks of high quality—On construction of think tank science.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22, 37(2): 168-176. (in Chinese)

From institution building to decision intelligence enhancement: Achievements and prospects of new think ta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ZHENG Yongnian[1,2] LIU Jincheng[1*]

（1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1, China;
2 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Qianhai,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Shenzhen 518172,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issuance of the “Opinions on Strengthening the Building of New-type Think Ta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2015,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hink ta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gone through a full decade. This period marks not only a critical transition from simply establishing think tanks to improving their quality, but also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China’s transformation from a major producer of knowledge into a strong producer of ideas. Over the past decade, China’s think tank development has achieved staged progress: from initial institution building to systematic formation, from ex post commentary to whole-process policy engagement, from single-source supply to multi-source support, and from passive response to proactive agenda-setting. As a result, the national think tank system has gradually taken shape.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structural problems remain prominent. The long-term dependency of knowledge systems, the short-term orientation of evaluation mechanisms, and the misalignment betwee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and talent composition have resulted in a persistent imbalance characterized by many think tanks but limited intellectual capacity. To address this problem,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clarify the distinctive functions of think tanks as differentiated from general research institutions, especially, their unique mission to identify and respond to major issues in key national domains, the multi-level policy reference and social influence of their research output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strategic, forward-looking, long-term, and reality-oriented research perspectives among think tank researchers. In the context of the AI er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n autonomous Chinese knowledge system, China’s think tanks need to move beyond institution building to

*Corresponding author

decision intelligence enhancement and accelerate the transition toward quality-oriented new think tanks.

Keywords new think ta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ecision intelligence enhancement, autonomous Chinese knowledge system,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quality-oriented new think tanks

郑永年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国际关系、外交政策、中美关系、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等方面研究。E-mail: iia-director@cuhk.edu.cn

ZHENG Yongnian Chair of the Academic Committee of the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lso professor and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Qianhai,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His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ar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na’s foreign policy, Sino-US relations, China’s domestic transformation and its external relations. E-mail: iia-director@cuhk.edu.cn

刘金程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科技创新治理、高校智库管理研究。
E-mail: jinchengliu@scut.edu.cn

LIU Jincheng Deputy director and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of the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is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a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governance and the management of university think tanks. E-mail: jinchengliu@scut.edu.cn

■责任编辑：张帆